

文学中的“终极关怀”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比较文学 与宗教研究”圆桌论坛综述

Ultimate Concern in Literature: A Review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Roundtable of the XIII Triennial Congress of CCLA

崔子鹏
CUI Zipeng

作者简介

崔子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候选人。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UI Zipeng, Ph.D. candida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kinz@ruc.edu.cn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Roundtable of the 13th Trienni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CLA) was held at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China, from July 24-26 2021, under the theme “Ultimate Concern in Literature.” 22 scholars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UK and the US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papers. During the three-day meeting, a range of issues were discussed by participants, from the significance and extension of the Ultimate to how literature expresses “Ultimate Concern”; “Ultimate Concern” in classical civilization; the modernity and “Ultimate Concern,” and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Ultimate Concern.” This review outlines th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Roundtable and their major findings.

Keywords: Ultimate Concern, Literature, Religiou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导言

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与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承办的第十三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比较文学与宗教研究”圆桌论坛于2021年7月24—26日成功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黑龙江大学、闽江学院、济南大学、河南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耶鲁大学、澳门圣若瑟大学、美国贾德森大学的22位与会专家就“文学中的‘终极关怀’”这一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在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看来，“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并不负责处理或解决“终极”的问题，而是对冠以“信仰”之名的意向性行动的进一步阐释。如字面意义所示，它的一端是绝对的“终极”所在，另一端则是源自有限个体的“关怀”。人们对“终极”的体认近似于一种存在主义式思维，以自身之“有限”遭遇世界之“无限”，“无限”便成其“神圣”与“终极”。“关怀”则是某种“行动”的“发生”之“生”，因为投注“关怀”，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才产生了进一步具体连接的动力。“终极关怀”代表着有限的个体在近乎无限的距离下对远方“终极存在”的遥望与沉思。推而言之，于更广阔的人文学科语境中，对“终极关怀”的体认和思索更可以被转化为站在人类有限性一端遥望存在之“无限”意蕴的体验，它从人类文明诞生的那天起就作为一种基本的问题意识存在，进而演化出哲学、宗教与文学等多种“关怀”的具体形式。“终极”之问无关某个明确的命题，也从来没有唯一的回答，面向“终极”的“关怀”也就代表了在所谓“答案”之前永远保持敞开的无尽可能。

七场圆桌讨论历时三天，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以下主题展开了精

彩的论述：“终极”问题的意义及其延展；文学何以表达“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在哲学史视域中如何呈现；古典文明中的“终极关怀”；串联神学、哲学与神学重要问题的“终极关怀”；从文学的角度看自我与终极者的相遇；宗教领域的跨文化对话；“终极关怀”与“神圣”之间的张力等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慧林、曾艳兵，北京语言大学张华、山东师范大学于冬云、中央民族大学宋旭红、澳门圣若瑟大学麦侍文（Stephen Morgen）、美国贾德森学院（Judson College）金容希（Sharon Kim）等发言人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一、文学与“终极”的延展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通过论文《从〈李尔王〉解读终极关怀》阐述了本次圆桌论坛的主题，并以莎士比亚名作《李尔王》和英国王朝历史为例说明西方文化中的“终极”问题。《李尔王》改写了“老王复位”的民间故事，不断质疑任何一种“被作孽多过自作孽”的“脱罪”之说。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在告诉世人，世间的悲剧总是无可挽回、也无从避免；早有鉴戒、却循环往复；伤天害理、又不知何为天理；罪孽深重、却无人敢称自己是纯然无辜的受害者。在杨慧林看来，莎士比亚让“自作孽”与“被作孽”相互消解，又通过理性、历史甚至神明的内在悖谬，最终使“终极”的问题在“终极”的意义上重新提出；这亦如弗莱通过“次级关怀”揭示自我神圣化和自我合法化的虚妄，进而重构“终极”的问题。因此，勘破一切可能的“伪终极”应该是“终极关怀”的基本前提；“何为终极”（what is the Ultimate）的追问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注定会转向“何以思考终极”（how to think ultimately）的逻辑。

贾德森大学金容希（Sharon Kim）的论文《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中的忏悔与终极性》通过另外一部名著来讨论文学中的“终极关怀”。她认为，《白鲸》中的“忏悔”乃是回应“终极性”的一

种模式。忏悔是有限的人类与无限的神圣之间的中介，起到了整合而非分裂的作用。在人类与神圣的互动过程中，忏悔令人类经历了生存转变，让人得以适应神圣，减弱因接触全然他者而招致的毁灭性元素，使二者之间的相遇转移了直接的创伤，并防止后续创伤的重演，同时，忏悔为人类接近神圣打开了一处通道，允许神圣的终极性通过人类语言而为人所知，从而彰显出只能以忏悔的方式才可以揭示的神圣层面。耶鲁大学司马懿（Chloe Starr）教授对这篇论文做出了回应，认为在《圣经》文本和虚构文本之外，“忏悔”的时间特质往往被人忽视。忏悔产生于人与上帝的相遇，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42：5-6）亚哈船长与约伯同样面对“终极”，亚哈船长何时忏悔，又为何而忏悔也能成为从文本论及“终极关怀”问题的入口。

黑龙江大学田刚健的论文《对极性——巴别尔小说主题悖反中的终极关怀》讨论了对极性与“终极关怀”之间的互相阐释。“对极性”是一种贯通历史与当下、现实与传统之间隔的对立统一状态，藉由此概念，田刚健切入了巴别尔小说中的“终极关怀”。中西方对“终极关怀”的理解或有不同的侧重，但同样都是未来对当下的召唤和塑形。文学作为一种个人化的情感经验，在对终极关怀的关照中方成就其公共性和永恒。俄罗斯文学中浓郁的极端化色彩充满了对极性的向度，这和东正教中的密切关怀维度相关。巴别尔作为苏联革命文学话语中的另类，其特征是暴力与梦幻混杂的异类风格，对极性与悖论性可以说是他的创作核心。通过分析小说主题的对极性特征，文本中有限与无限、神圣与日常中的意义和魅力才能在不确定性中真正成为一种“关怀”。

中国人民大学曾艳兵在卡夫卡研究中进一步延展了“终极关怀”的文学意义。《卡夫卡作品中的终极关怀》讨论的重要问题缘自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和南希《无用的共同体》中不约而同提到的“共同体的崩解”。卡夫卡的小说描绘了共同体的焚毁，预示了我们当下所

处的时代。卡夫卡一生似乎缺乏统一的坚定的宗教信仰，但他始终不缺乏对个人乃至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就是深藏于内心的“不可摧毁之物”。在卡夫卡那里，希望是有的，但似乎不在这个星球上。逃出地球，流浪地球，或者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卡夫卡最终抛弃了一切，他选择了创作，因而拥有了最后的希望。卡夫卡的作品总是纠缠在死亡与自杀这些致命的问题上，正如卡夫卡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深陷其中一样。在卡夫卡看来，那些最有意义的书就是一些类似自杀的书，“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

云南大学黄增喜试图立足于黑塞与伊利亚德在思想倾向、文化立场等方面的相似性，以伊利亚德的宗教观念为参照，分析黑塞的乡愁主题，并由此间接观察“终极”问题。在论文《永恒、自我与自然：以伊利亚德宗教观念解析〈东方之旅〉的乡愁主题》中，黄增喜指出，在伊利亚德看来，宗教传达着人类对于完美的神话乐园之乡愁；虽然传统宗教在现代世界走向了衰落，但“乐园的乡愁”却在现代文化与文学艺术中得到大量的遗存。结合黑塞其他代表性作品来看，《东方之旅》中的乡愁包含“永恒”“自我”“自然”三个维度，与伊利亚德所言“乐园的乡愁”形成了诸多层面的呼应。具体而言：东方之旅既是人类克服时间性存在、寻归永恒家园的精神之旅，也是个体克服对极性存在、追寻整全自我的象征之旅，还是人类克服其与自然的对抗、恢复原初和谐的乌托邦之旅。虽然黑塞主要将克服现代精神危机的希望寄予艺术，但其对危机根源及克服危机之途的思考均带有浓郁的宗教底色，始终在艺术与宗教之间游移。就此而言，在《东方之旅》和黑塞此前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延续性。在伊利亚德宗教理论视阈中考量《东方之旅》，不仅有助于澄明作品中的诸多隐晦细节，也有可能为黑塞其他作品的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参照。

二、古典文明中的“终极关怀”

早期古典文明的“终极”体验往往与死亡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赵惊的论文《〈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幽深”》简述了史诗《吉尔伽美什》的发掘背景与情节，并着重讨论文本中与“死亡”相关的意象。吉尔伽美什对死亡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他并不在意死亡，但他在经历了挚友恩启都的死亡之后，踏上了寻求永生的道路。死亡之“幽深”在史诗中表现为不可想象与不可预测：“顷刻间，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成子虚。”论文最后还对比了史诗中“寿满天年”之人“自己的命数之死”（mūt ilišu）与里尔克《贫穷与死亡之书》中“自己的死”（der eigene Tod），指出“终极关怀”下死亡的意义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张靖的论文《失与得：圣经比喻中的终极关怀》所讨论的“失与得”问题乃是弗莱“次级关怀”的进一步思考，因为勘破“次级关怀”虚妄的行为意味着既有所失，又有所得。张靖提出，应考虑《新约圣经》中耶稣比喻（Parable）这种特殊文体的功能性，耶稣使用这种文体是为了解构和颠覆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意义和价值。论文以《路加福音》15章的“失羊比喻”“失钱比喻”和“失子比喻”为例，重新解释“失”与“得”的内容以及文本中隐含的诠释张力，进而提出，耶稣的三个比喻指向的天国有着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得失”观和伦理观，世人在“失”后会“得”，但“所得”并不是我们预先期待的东西，而是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伦理和秩序。终极问题只能通过有限的感知来启发我们，因此耶稣通过比喻这样的故事打破我们所认可的世界的深层结构，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中隐而未现的方面。这些故事拆除了我们的防御，让我们真正与“终极”的问题相遇，由此生发“终极关怀”。

中国人民大学李丙权挖掘了古希腊哲学中的“终极关怀”思考。

他在《灵魂不朽和苏格拉底的拯救》中提出，“苏格拉底事件”“基督事件”都是历史人物的死亡，不仅仅关乎两个肉体的死亡，引发了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事件在《申辩》《克里同》《裴多》等古典文本中呈现出不同的侧面，并影响了随后的哲学传统与神秘主义传统。苏格拉底与终极关怀的连接集中在两个面向：情感上的“关怀”与关怀之物确然能够被称之为“终极”。哲学中的“终极”与宗教中的“终极”类似，在哲学中同样表现为不可实体化、不可理论化的形式概念。苏格拉底以“灵魂不朽”论证“终极关怀”，以《理想国》中“灵魂三分”的行动原则反观自我与人格的构建，思考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通过对终极世界的灵魂的观望以及对人间正义与至善的追求，对“终极”的思考同样也成为了苏格拉底哲学中对“何为好的生活”之反思。

三、“终极关怀”与现代性

中国人民大学汪海试图说明主体的“见证”行为乃“终极关怀”得以成为问题的重要前提之一。《历史之外的证言：利科、德里达论文学的见证》此篇论文梳理了奥斯维辛之后，现代西方人文学界关于“见证”之困境的诸多讨论。论文通过整合利科、德里达等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从跨文学、哲学与宗教的角度考察文学与见证的关系。二人都高度重视文学在见证中的独特作用，虽思想进路不同，但他们对见证的重新解释却有许多共鸣之处。其中利科的见证始终处于包含见证者、证言和听众在内的盟约与行动，并带有了神学的意味。德里达的见证则偏向构建行动与语言的创造性关系，将见证诉诸审判，从而赋予了文学在历史之外的末世论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宋旭红从我们所身处的虚拟时代出发，思考“终极关怀”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她的论文《虚拟时代的诗意真实与终极关怀》从海德格尔和余秀华“农妇的世界”说起，海德格尔藉艺术作品

中“农妇的世界”之敞开论证艺术的本质即“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当代诗人余秀华以自身经验构建“农妇的世界”，其诗歌蕴含了独特的梅洛—庞蒂式知觉主体的视角。身体—知觉世界与诗性/艺术世界之间的对比就涉及了当代世界的人们对“终极”的感知变化，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甚至是它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它是后者“有限/无限”场域中的有限性维度。而在虚拟技术飞速发展，“去身体化”日渐成为风潮的今日，“终极关怀”还是能否作为一个具体的问题，所谓“诗意的真实”又将去向何处？宋旭红教授认为，目前还没人能给出答案，在“去身体化”的逻辑里面，“农妇的世界”正在变成被围观的“景观”，而围观尚且不具有探知存在深度和构建世界的力量。

北京外国语大学黄强聚焦著名诗人艾略特，以《沉沉死气荒原漫，终极关怀何处寻？》为题，探索艾略特对“终极”问题的思考。黄强认为，无论批评界采取何种方式解读《荒原》，都绕不开《荒原》所引出的“终极关怀”议题。《荒原》诗中引用了大量的比喻和典故，同时也能让读者在阅读时代入到当下的情境与危机之中，以弗莱所言之“超越性”介入到“终极关怀”的问题之中。《荒原》的六节诗章可以被解读为人类文明与精神发展的历程，论文详细介绍了每节诗章与文学史乃至文明史的关联，及诗歌如何从西方古典文明、现代世界和东方印度教思想进入“终极关怀”的问题领域。艾略特的《荒原》展示了一个即将崩溃的世界，亦通过文学的路径重新思考“终极关怀”的多种可能。

南京师范大学许诗焱则介绍了荒诞派戏剧中的“终极关怀”，她以《从文学经典看终极关怀——荒诞派戏剧》为题，聚焦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指出，“荒诞”实质上是人在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之后与生活之间的分离，其哲学基础与存在主义类似，却更多地跳脱了理性的藩篱。论文指出，荒诞派戏剧的形式与文本在研究的过程中同样重要，其表演形式有时能引起观众更多的反思，“开始”与

“结束”在表演中以“死亡”与“新生”的倒转形式与“终极关怀”相契合。

四、“终极关怀”的宗教维度

圣若瑟大学麦侍文 (Stephen Morgan) 的论文《实现有形与无形之事：若望·亨利·纽曼著作中宗教想象力的作用》以19世纪英语界最多产兼极具影响力的基督宗教作家亨利·纽曼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纽曼对想象力作用的理解出发考察“终极”与信仰，“终极”与想象的关联。纽曼的作品结合了基督教的情感与理性，用个体的想象力连接了宗教的客观教义与个人理解。他认为宗教的真理更多的时候在用一种想象的方式进行表达，因此宗教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更加接近宗教的“真理”。“想象”在纽曼的宗教文学中并非与“真实”对立，而是一种独特的认知能力。具体来说，纽曼的“想象力”是心智的能力，它通过在个体的心中构建图像，成为一种利用“心灵的眼睛”领悟启示的过程，即所谓的“相信如看见”。通过想象力的唤起能力，主体才能在心智中充分理解宗教理念本身所具备的超越性。格拉斯哥大学的大卫·贾斯柏 (David Jasper) 教授在回应论文时补充说明了纽曼研究的其他重要问题，如纽曼的“想象力”远离柯勒律治“想象力”论说的原因，想象力是否与圣事相关联，理性与想象力的关系，想象力何以超越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的对立，以及在纽曼的论证中，想象力如何使“观念”更加真实。随后，麦侍文教授从纽曼本人的创作经历出发，指出“想象力”在纽曼的思想中怎样通过“类比”和“意义”的桥梁呼应“现实”。

北京语言大学张华从生态神学的角度思考“终极关怀”，其论文《生态神学是什么？》介绍了生态神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论文从批评基督徒神学的必要性切入，在传统基督教神学中，“神人之约”不仅确立了上帝的绝对神圣地位，也赋予了人管理万物的职能，

此种认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类在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时狂妄自大的态度。莫尔特曼认为,所谓神对人的授权,以及人对自然无限的征服实质上是对上帝诫命的误读,以及一种试图成为上帝的“僭越”。张华认为,人类文明目前遭遇的生态危机是否能够完全归结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上仍值得探讨,但生态神学确实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反思的进路。最后,论文回到文学和生态反思的结合,在今日的语境下,只有通过文学和批评的联合才能充分表达和表现“终极关怀”之要义。

济南大学文学院刘丽霞的论文《清末民初天主教白话圣经译写及其滞后原因》转向了与“终极”问题密切相关的中文圣经翻译。她指出,清末白话文运动同样影响到了天主教的《圣经》统一译文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些见诸笔端的论辩,折射出天主教内部对白话文运动的多面心态。天主教本身较为保守的理念和侧重底层的传教策略也导致教士们对社会变革缺乏适应能力,经文的翻译工作也极为繁重和艰巨。此外,教理书籍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教众阅读经文的注意力,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天主教的白话圣经译本工作因此而拖延。对比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及传播,天主教传教士于清末民初的传教策略局限性则更为明显。

本次圆桌论坛汇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诸多优秀学者,对“终极关怀”相关的各种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终极关怀”之问题在当今已经变得无比重要却也极易被人忽略,从古典文明、哲学、文学、宗教等角度对“终极关怀”的多元化思考恰呼应了人文学者最重要的批判与反思精神。无论“何为终极”还是“何以终极”,作为个体的“终极之思”本身就闪烁着从“有限”飞越“无限”的智慧之光。